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尼尔·弗格森： 我是在批评那些老旧的历史描述方式

本报记者 刘迪

对于人类历史而言，网络和政府同样重要

文汇报：我们知道“网络”这个概念很早就已经在您脑中盘旋了。撰写《基辛格传》期间，您就曾在美国政治媒体 Politico 发表文章称：“如果我第一册用理想主义者这个副标题让读者感到惊讶，那么第二册的副标题是不是应该用人际网络构建者（Networker）。”并提醒人们应该留意基辛格建立与维护人际网络的卓越才能——包括与政府成员及社会各界的人际关系维护。而在新书《广场与高塔》中，网络成为贯穿整部作品的灵魂。网络为何如此重要？技术革新对于网络有何影响？

尼尔·弗格森：我认为，大多数历史学家把太多时间花在了书写政府组织等垂直的“等级结构”上，却没有给分散的、处于平行结构之中的网络给予应有的笔墨。认真梳理一下历史，我们会发现网络和政府同样重要。可是，由于没有充分的档案文字留下，写“社交网络”并没有那么轻松，要找寻历史上重要的社交网络案例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历史上的大变动往往是由一些没留下多少记录的非正式组织造就的。我认为，在人类最早期的历史中，社交网络就扮演着重要角色。《广场与高塔》一书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我们需要把非正式的社交网络还原进历史场景之中。

技术革新时刻改变着网络的运行方式。伴随着印刷媒体、计算机、智能电话等新的信息技术的出现，社交网络运行的速度显著提升。把今天，2019年与1619年相较，信息流动的速度提升了几千倍。而如果抛掉传播工具的演进，信息传递的速度仅仅提升了数十倍，因为我们人类的大脑仍需要思考、决策的时间。

文汇报：不过，硬币也有另外一面。技术革新在大幅度提升信息流动速度的同时，对于人们的生活是否存在消极

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曾被媒体评价为“大西洋两岸最受关注的经济史和国际关系学者之一”。这位来自苏格兰的历史学者常常另辟蹊径，且不惧于提出“违背事实”的问题。他的《战争的悲悯》《罗斯柴尔德家族》《帝国》《文明》《基辛格：理想主义者》等十余部著作作为国际畅销书。2008年，根据其作品改编的PBS系列纪录片《货币崛起》获国际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奖。2011年，其电影公司推出

的首部长篇纪录片《基辛格》获纽约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2016年，《基辛格：理想主义者》获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阿瑟·罗斯著作奖。

弗格森执着于把一个历史人物、一段段历史故事、一场场历史战争还原进入曾经的那个时空，希望可以从中梳理出一条真实的脉络。他善于将艰涩的理论演绎得深入浅出，并且相信“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他不仅仅是一位象牙塔里的学者，而是乐于将所学付诸



实践。

近日，弗格森携新作《广场与高塔：网络、阶层与全球全力竞争》（中信出版集团，2020）来沪，其间接受了《文汇报》的采访。

书中写到的“光明会”，一个近两个半世纪前成立于德国，试图改变世界的秘密网络。它因为丹·布朗（Dan Brown）的小说《天使与魔鬼》而为人们所知。很多人认为“光明会”是虚构的，但事实上，它真实存在。因为在巴伐利亚确实可以找到18世纪晚期关于这个组织的记录。

一些社交网络确实只留下很少的记录，尤其以那些犯罪网络最难研究。如黑手党就是最典型的案例，因为关于它的唯一档案资料只有犯罪审判记录当中的证人证言。仅有这些还是难以还原这些网络的运作方式。

不要“把一战、二战呈现为海、陆、空三军，一场场战争、战役的串联”

影响？

尼尔·弗格森：人类不断创造互联网等新的技术，并在此基础上打造网络平台。网络平台通过把用户的注意力卖给广告主赚钱。在这种情况下，网络在扭曲的状态下运行。像脸书与谷歌，为了保持用户的活跃度，就必须让他们看到一些让人感到兴奋的东西，而这些能够让人感到兴奋的东西常常充斥着假新闻和极端的观点，而非那些波澜不惊的真实新闻所能够比拟的。

英国下议院议员伊薇特·库珀就曾指出脸书没有主动删除一个标题为“禁止伊斯兰教”的页面。这是2017年的事。正

如她所说：“我们需要你们做更多的事情，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来保护民众。”同一周，德国司法部长海科·马斯公布了一项草案，对未能删除“仇恨言论”或“虚假新闻”的社交网站处以高达5000万欧元的罚款。人们已经发现技术革新需要矫正的部分，只是现在做的还远远不够。

技术革新在推动行业进步的同时，也在悄然改变着公共领域。人类社会有史以来，从未有如此多的人在一个即时反应的网路中，被连接在了一起。通过这个网络，“迷失”可以比自然病毒传播得更快。

必须强调的是，“让全世界

都参与到这个网络中来，然后创造出一个网民的乌托邦、网络空间人人平等”的想法从来都只是一个幻想、一个错觉。现实是，某种程度上，全球网络成为了各种狂热和恐慌的传播机器。2008年金融危机、“9·11”事件、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等等，无不发生在网络处于上升势头之时，或者“基地”组织恐怖分子聚集在网络聊天室的时候。

文汇报：您是如何取得关于网络的历史档案资料的？

尼尔·弗格森：网络的历史档案资料难于搜集，但并非不存在。如我在《广场与高塔》一

关于信息革命，我们需要理解的三个要点

第一，这几乎完全是一项基于美国的成就，尽管来自世界各地涌入硅谷的计算机科学家和降低硬件成本的亚洲制造商也做出了贡献。其次，美国最重要的科技公司现在仍然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优势地位。第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优势会转化为巨额资金。面对这场来自美国的网络革命，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有两个选择：妥协并加以监管，或者抵抗并发起竞争。欧洲人选择了前者。想要找到欧洲本土的搜索引擎、在线零售商或者社交网络的努力基本上都

是徒劳。

相反，中国人选择了第二种方式：竞争。这对于美国来说有些出乎意料。如今，中国的互联网被BAT主导。然而，这些企业绝非美国同行的翻版，每一家公司都显示出自身的创新性——它们的综合市值超过4730亿美元，年收入超过200亿美元，规模几乎和美国同行一样大。中国86%的互联网用户在使用微信，微信二维码迅速成为覆盖亚洲商圈的支付方式。

毋庸置疑，硅谷被排除在庞大的中国市场之外，并对此咬牙切齿。即便扎克伯格选择用普通话接受采访，依旧没能扳回这一局。

去哪里找关于网络的隐秘资料

我读研究生时就是一个环保主义者，我还记得当时我去汉堡国家档案馆，被带到了令人非常迷茫的房间：里面到处都是用皮革装订的厚重书籍，他们用几乎让人看不清的旧德国文字手写而成，这些书组成了档案馆的目录。他们又指引我找到了汉萨同盟古典官僚机构中各种“代表团”写的无数报告、记录簿和信件。我还清晰地记得自己去翻阅了那些与我感兴趣的时期相对应的书籍，但令我震惊的是，没有任何一页的内容能吸引我。这样的痛苦持续了几个星期，之后我终于得到了解脱：我在英国领事馆的一次茶话会上有幸认识了银行家马克斯·沃伯格的儿子埃里克，他将我带进一个小小的橡木镶板房间，里面存放着沃伯格的私人文件。我当时的研究主题是：20世纪20年代早期德国恶性通货膨胀的历史，短短几个小时我就意识到，沃伯格与他的人际网络成员的通信能给我提供更多这方面的资料，甚至比英国国家档案馆中所有的文件加起来还要多。

——尼尔·弗格森《广场与高塔》

（下转3版）➔